

# 游牧文明史论

李尔只斤·吉尔格勒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K203  
296

# 游牧文明史论

ᠶᠤᠮᠤᠨ ᠠᠨᠠᠭ ᠤᠨ ᠤᠨᠤᠨ ᠤᠨᠤᠨ ᠤᠨᠤᠨ



李尔只斤·吉尔格勒 著

ᠨᠢᠷᠯᠢᠵᠢᠶᠢᠨ ᠵᠢᠷᠭᠢᠭᠡᠯ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1049 号

游牧文明史论/李尔只斤·吉尔格勒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SBN 7-204-06252-3

I. 游… II. 李… III. 牧民-文化史 IV. K·420

|      |                          |
|------|--------------------------|
| 责任编辑 | 娜 拉 巴德日夫                 |
| 封面设计 | 丹 森 聂森娜                  |
| 书 名  | 游牧文明史论                   |
| 著 者  | 李尔只斤·吉尔格勒                |
| 出版发行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印 装  | 内蒙古党校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印 张  | 10 印张                    |
| 字 数  | 241 千字                   |
| 版 次  |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204-06252-3/K·420 |
| 定 价  | 精装 38.00 元 平装 28.00 元    |

## 序

近些年来,我有机会游学列国,穿行本土,以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历史与现状,中心与边缘,结构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探讨知识与事实的新格局。虽如此,治学之余常自愧学识不足,蒙李·吉尔格勒君不弃,嘱为作序,多年之谊,敢不从命。

今人所用“文明”词义,乃西来观念,与本土知识体系尚有许多磨合之处,且不能不警惕“语言帝国主义”及“话语霸权”陷阱。来自不同认知体系的人,以不同的眼光看历史、评现状、望未来。西文近代大事无不与法国革命联系,但在穆斯林世界,这样的话语却没有多少空间;西洋历已经成为科学工具,但中国人大多用本土的历法计算自己的农时和传统节日。现代化不能完全取代不同族群的乡情、亲情、爱情的本土表达方式。要对“文明”作本土定义,让它变成众数,共存并置,这是必要和必须的。

## 2 游牧文明史论

---

游牧文明的精华,在于它的世界观、价值及其应用。游牧人把自然对象化的同时,也把他人和自己对象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四种生态理念和社会实践: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自然生态。所谓社会生态,指草原上视需要时散时聚的社会组织形式;经济生态,指充满原动力的贸易需求和多种经营的谋生方式;政治生态,指牧人与农民在政权运作上的互相作用乃至互相影响;自然生态,指游牧族群服从“长生天”的可持续生计模式。

游牧文明孕育了游牧人的开放、商贸、诚信和英雄主义基本精神,匈奴、月氏、柔然、突厥、契丹和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元代的海上贸易,都是游牧社会的本能表达。蒙古人用波斯人的工匠、中国人的火药创造了攻城术;蒙哥可汗举行“宗教大辩论”,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当代云南蒙古人用汉族的观音会、彝族的跳乐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

游牧文明的边界是流动的,视野是开阔的,这与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暗合,与庄子“绝圣弃智”的哲理相应。

反观当今世界,生态观念深入人心,商品和数字化形象全球流动,人文关怀重新得到提倡,游牧文明的精华重新拥抱人类。

文化与文明的内在价值无先进与落后之分,“美美与共”才是

上乘境界。单线进化论的社会史观已经被中国经验所否定,也被大量的人类学田野个案所否定,包括游牧文明在内的非西方文明的价值已昭然若揭。

需要强调的是,游牧文明并不仅仅等于游牧,不等于靠天吃饭,不等于“能歌善舞”和“骑马射箭摔跤”等等可视表象,游牧文明的核心在于从游牧社会生活中提炼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应用,亦即其精华。若此论不谬,则呼和浩特、北京、昆明乃至伦敦、纽约,皆可为游牧文明理念表达的舞台。

谨以此附庸李·吉尔格勒君大作。

纳日碧力戈

2001年12月于北京太阳宫

## 前 言

本书最初的理念和建构始源于上一个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当时全国已经恢复高考,我们这些来自草原的牧人之子,步入了大学神圣的殿堂。就像从沙漠中逃出来的游人,见到了绿洲一样,欣喜若狂和如饥似渴的读书。这时,有人提出来: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思想,更没有哲学。请问,你们有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那样的哲学家吗?你们有《小逻辑》、《基督教的本质》等这样的哲学著作吗?回答说:我们没有。对方说:那就对了,你们既没有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家,也没有《小逻辑》那样的哲学著作,你们哪里来的哲学?你们哪里来的文明?你们被尊为历史经典著作的《蒙古秘史》,也不过是充满了文学色彩的神话传说那样一类的东西。一时间,把我们问住了。我们就开始反思自己的游牧业,当时还不敢提游牧文化,因为游牧是不是一种文化都成

了问题,更别提游牧文明了。文化反思的结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游牧的蒙古人有没有哲学?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哲学?它的逻辑始源在哪里?为什么?它的特征、构型、模式是什么?为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又回到了什么叫哲学?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宗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接下来就是被称为哲学和文明的标准是什么?类型是什么?其次是谁定的这个标准?凭什么?为什么?在各位恩师的直接指导和筹建下,我们成立了蒙古族哲学及思想史研究会。当时我们这些学生都参与到了课题组的研究中来,我主要承担的课题任务是民族学和宗教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具体地说,就是蒙古族古代宗教哲学研究。经过一定阶段的研究以后,我们得出结论:游牧人有哲学!游牧人有文明!有人的地方就有哲学,因为人是思想的动物,哲学是人类精神的花朵。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哲学。“正如上帝赐给手以不同的手指一样,同样的,他也赐给了人们不同的方式”——蒙哥汗语。这就是说,不同的族群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哲学和文明。这句出自十三世纪中叶的蒙古可汗之口的话,本身就是哲学。我的主要成果显示于《民族学史论》(1989年)和《蒙古政教史论》(1996年)二部专著中,而拙作《游牧文明史论》则是上两部专著的续篇。

因为我主修的是人类学、民族学和宗教学课程,更注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考古学的田野考察报告和旅行家或探险家们的手记、札记、游记、民族志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在本书中我更多地利用的是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资料和成果。本书的研究基础和前期准备工作,主要依据的是本人于1983年在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鄂伦春旗、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的短期的田野调查;1987年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蓝旗、白旗的牧业“草畜双承包”情况的调查;1991年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察;1991-1993年,在蒙古国和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进行的民族学田野考察;1995年,与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民族宗教处联合组成的考察团,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进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族关系”课题的调查;1996年在呼和浩特市,锡林浩特市及其近郊进行的“中国蒙古族人口流动、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意识”国际合作课题的田野调查。(该课题主持人为澳大利亚沃龙岗大学社会转型研究中心阿尔代尔·罗宾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室主任纳仁碧力戈博士);1997年,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进行的民族学田野调查;1997年,在乌兰察布盟四子王

旗进行的教学和民族学田野考察,1998年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进行的教学科研和民族学田野考察;1999年在乌兰察布盟达茂旗进行的教学科研和民族学田野考察;2000年7月参加的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2000年中期会议,入选论文为:城市化与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的变迁,(3万余字);2000年9月参加的中国与挪威《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际研讨会,入选论文为:《论少数民族与优惠政策》,(1万余字)以及1999年、2000年、2001年的内蒙古自治区游牧文明研讨会的个人研究成果。凭着我浅薄的学识,游牧文明这个题目或许太大了,还是有待于今后来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它。本书如果能够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和争鸣,更奢望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李尔只斤·吉尔格勒

2001年12月25日

## 题 记

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  
为这么多的人，  
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

——温斯顿·丘吉尔

# 第一章 解读游牧文明

## ——对游牧文明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检讨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向海外扩张和殖民，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交通运输工具和通讯手段的更新和普及，西方各国的工业、商业、航海业、铁路的迅猛发展，西方各国的探险家、冒险家、商人、学者、传教士尾随殖民者纷纷踏上非洲、美洲、亚洲、大洋洲诸岛屿。开始大量报导各大洲鲜为人知的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这就促成了西方各国纷纷建立研究原始民族或称原始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学、东方学研究会、研究院、学术机构、博物馆和出版专门性的刊物，并在各大学开设人类学、民族学和东方学的课程。1822年，法国成立亚洲研究会，1839年，法国成立了巴黎民族学协会；1823年，英国成

立皇家亚洲研究会,1842年英国在伦敦建立了民族学协会;1837年,俄国在彼得堡建立了民族学博物馆;1842年,美国成立东方研究会;1848年,丹麦在哥本哈根成立了民族学博物馆;1868年德国在柏林成立了民族学博物馆;1869年,出版了民族学专刊;1867年,德国民族学家巴斯提安(A. Bastian, 1826 - 1905)在柏林获得民族学教授学衔。随着人类学、民族学、东方学、地理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的不断发展,把生命和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起源、特征和类型的研究纳入了现代科学研究的领域。其中对人类文化史和文明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名著有:英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1809 - 1882)的《物种起源由于自然的选择,或生存竞争中适宜品种的保存》(1859年)、《人类的由来兼论性选择》(1879年)、赫胥黎的《就动物学的论据,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63年)、海克尔的《人类进化论》(1879年)。在西方这种生物社会进化论的时代思想、思潮和精神的影响下,文化人类学界形成了文化进化论学派。

文化进化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爱德华·伯纳特·泰勒(Edward Burnete Tylor, 1832 - 1917),他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其主要著作有:《阿纳霍克:墨西哥与墨西哥人》(1861)、《人类早期史研究》(1865)、《原始文化》(1871)和《人类学》(1881)等。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给文化下了科学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整体。”这个定义有效地把握了文化的本质和一般特征。他还认为:人类社会文化是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进化和完善发展的,它们的发展进程表现为线性系列。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有的文化特质和因素被保留下来了,这就是“文化遗存”。它们不仅是各民族在历史上发展的活的化石和纪念碑,也是民族

学家研究的重点。民族学家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能够揭示这些习俗和仪式等文化遗存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从而达到再现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历史风貌和特征。

文化进化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国杰出的人类学和民族学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 - 1881),其主要著作有《易洛魁联盟》(1851)、《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1871)、《古代社会》(1877)、《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1881)等。他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以人类的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为标志,把人类社会划分为由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三个历史分期,并把蒙昧和野蛮时代分别划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蒙昧低级阶段,以野果和坚果为食物,音节分明的语言;蒙昧中级阶段,食用鱼类和获取火的知识;蒙昧高级阶段,发明弓箭;野蛮低级阶段:制陶术的发明和制陶业的流行;野蛮中级阶段:(东半球)饲养家畜、(西半球)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和使用土坯、石头来建筑房屋;野蛮高级阶段:冶铁术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文明时代的标志是“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文明社会分为古代文明社会和近代文明社会,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与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拼音字母之出现,也和其他伟大的发明一样,是连续不断努力的结果。迟钝的埃及人改进他们的象形文字,经过若干形式,才形成一个由音符文字构成的方案,而他们所尽的力气也就到此阶段为止,他们能把定型的文字写在石头上。随后出现了富于好奇心的腓尼基人,他们是最早的航海家和海上贸易者。不论他们以前是否熟悉象形文字,总之,他们似乎一跃就投入了埃及人所致力的工作,凭着天赋的灵感,他们解决了埃及人所梦想解决的问题。腓尼基人创造了由十六个符号构成的新奇的字母,及时地给人类带来了一种书面语言,人类由此有了写作和记

#### 4 游牧文明史论

---

载历史的工具。”<sup>①</sup>“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荷马诗篇的产生差不多可以作为希腊人进入文明的标志,不论这些诗篇在当时是用口传还是笔录的。”<sup>②</sup>“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sup>③</sup>摩尔根认为:全人类各民族都是遵循着由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达文明时代这样一种次序和历史阶段日渐进化发展的,人类社会有两种组织形式:原始社会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组织方式。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产生,母系氏族世系按母系计算,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占优越地位。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财产观念的出现,为了确定财产的继承人员是男子的后裔相传为其特征的;文明社会是以地缘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国家形式。私有财产的出现,社会必然分化出阶级,而阶级社会的组织方式就导致了政治国家的产生。

文化进化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力图科学地解释其人类的文化史和文明史的理论和方法,它对于民族学成为独立的学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化进化论的致命弱点在于: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时,很少注意各民族文化多元的结构和类型、历史特点和具体年代,特别是无视各民族长期的文化变迁的事实。而是把各民族在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似性作为依据罗列到他们进化理论的硬性框架中。这就产生了裁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危险性。使各具不同传统、价值、历史的民族文化被规定为机械的堆积和随意的组合,使文化进化论成为单线机械进化论,具有浓重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痕迹。他们忽视对特定民族文化的起源、结构、功能以及文化变迁的动态研究,而热衷于对各民族文化特质,即“文化遗存”的分析讨论,把极不相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的文化特质不加区别和选择地纳入其进化的程序之中。法国民族学

家列维—布吕尔批评过文化进化论的方法,认为他们用定理代替了论证,仅仅讲得通并不能代替论证事实。随着人类学和民族学大量的新材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现,单线文化进化论受到了全面的挑战。

在摩尔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进化清单和硬性框架之中,游牧社会不是作为一种文明类型,而是作为游牧社会的起源被他硬是塞进了人类野蛮时代的中期阶段。同时他坚持游牧社会起源一元论的进化观点,中亚和蒙古草原的游牧社会源于闪族和雅利安人的迁徙和传播。“到野蛮时代中期阶段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显然不知有谷物,却已经有了家畜,因而能得到肉类和乳类的供应,他们的生活状况远胜于美洲土著;处于同期的美洲土著虽会种植玉蜀黍等作物,却没有家畜。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雅利安族和闪族之所以得天独厚,主要由于他们之重视牲畜的繁殖犹如重视他们自己一样。他们事实上已将牲畜,包括它们的肉、乳和筋,统统安排在生活计划之内。人类当时没有其他任何种族,做到他们这一步,而且在他们两者之中,雅利安族又比闪族更进一步。无论是雅利安族或闪族,当他们一旦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势必要学会种植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维持其大群牛羊的饲料,然后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畜群重返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因此,如前所述,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并与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sup>④</sup>据苏蒙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文物学家、岩画学家、文化人类学卓有成效的对中亚、蒙古高原以及西伯利亚等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古墓和古代定居遗址的大量科研成果表明:<sup>⑤</sup>距今十几万年前,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地区就有北

亚狩猎者社会集团群落的活动遗迹。“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存在过新石器时代定居部落。其证明就是大片的居址遗址,居址中有生活过的人们建造的过冬用的半地穴式住所。这种住所发现于克鲁伦河畔——克鲁伦河左岸乔巴山市上游4公里处的奥包特山附近,以及塔穆查克—布拉克。在勒拿河畔,安加拉河畔,色楞格河畔、鄂嫩河畔也发现过同样的新石器时代的居址,这些村落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火燧石制品,其中有打制石块,经过磨磨的刀状石片、刮削器、陶器、炉灶建筑,石制成的碎石器和形状特殊——成小棒状——的石杵,木制挖掘棍上的石头加重器。综上所述,可以说明,外贝加尔地区及与其毗邻的中央亚草原的农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看来,新石器时代中央亚有过比现在更为湿润和暖和的气候,当时出现农业经济和蒙古首批农民定居习俗的重要条件。其证据是新石器时代居址地层中可以看到腐殖质层和砂层在经常进行交替。这种现象说明气候由湿润到干燥,反过来由干燥到湿润进行有规律的转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通常存在于腐殖质层中——覆盖着牧场土。特别是塔穆查格—布拉克出土的野牛头骨或犄角的宗教葬仪墓地表明,这些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定居农民和采集者在其居住地已经存在养育仔畜。从而开始了野生动物——此后家畜的祖先——驯化的地方性过程,这一过程又被蒙古岩画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科布多(吉尔格郎图)市附近的‘马崖’上刻制有无数的牛马图形所证实。总而言之,中央亚新石器时代诸部单独驯养牛马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到青铜时代即公元前2千年或3千年期间所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创立独特的高度发展的中央亚游牧诸部的畜牧业文化综合体,关于这一点,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的方形墓文化遗存(笼头、马衔、牛轡、鞍子、牛皮帐篷、马奶酒和奶食以及其他等等)将为我们提供大致的印

象。”<sup>⑧</sup>这些考古发掘的科研成果,足以推翻中亚、蒙古和西伯利亚的游牧生活是从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周边地区的雅利安族和闪米特族人那里传播过来的历史结论。而是从蒙古高原的狩猎者那里转化过来的,这一点已经一再被考古学、古生物学、地质学和人类学的新的科研成果所证实。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形成了文化传播论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弗里茨·格拉布涅尔,德国民族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05)、《民族学方法论》(1911)、《民族学与历史》(1911)、《文化历史中的图腾崇拜》(1915)、《民族学》(1923)等。威廉·施米特,德国、奥地利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南美的文化圈和文化层》(1913)、《澳大利亚语言的分支》(1919)、《南岛语系各民族宗教和神话之比较概要》(1910)、《民族与文化》(1924)、《种族与民族》(1927)、《民族学方法》(1937)。格·埃·史密斯,英国著名的民族学家、解剖学家、体质人类学家兼考古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古埃及人》(1911)、《早期文化迁徙》(1915)、《人类史》(1930)、《文化的传播》(1933)等。文化传播论认为:各民族不同文化出现的相似性既不是由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所导致,也不是各民族独立创造发明的巧合和复合。各民族的文化难以独立产生和发展,人们不能处处创造文化,而只能接受文化。只有几个优秀的民族才能创造文化,并以此为中心向外扩散传播到各地区、各民族当中去,形成不同的文化圈。整个人类文化史只是几个文化综合体即文化圈在地球上移动和传播的历史,是它们彼此之间吸收、借用和结合的历史。这种文化借用和传播的过程,便是“文化历史”的基本内容。民族学的目的和任务就是研究这种不同文化圈的过程。

文化传播论者的历史主义的实证论试图揭示人类文化起源发